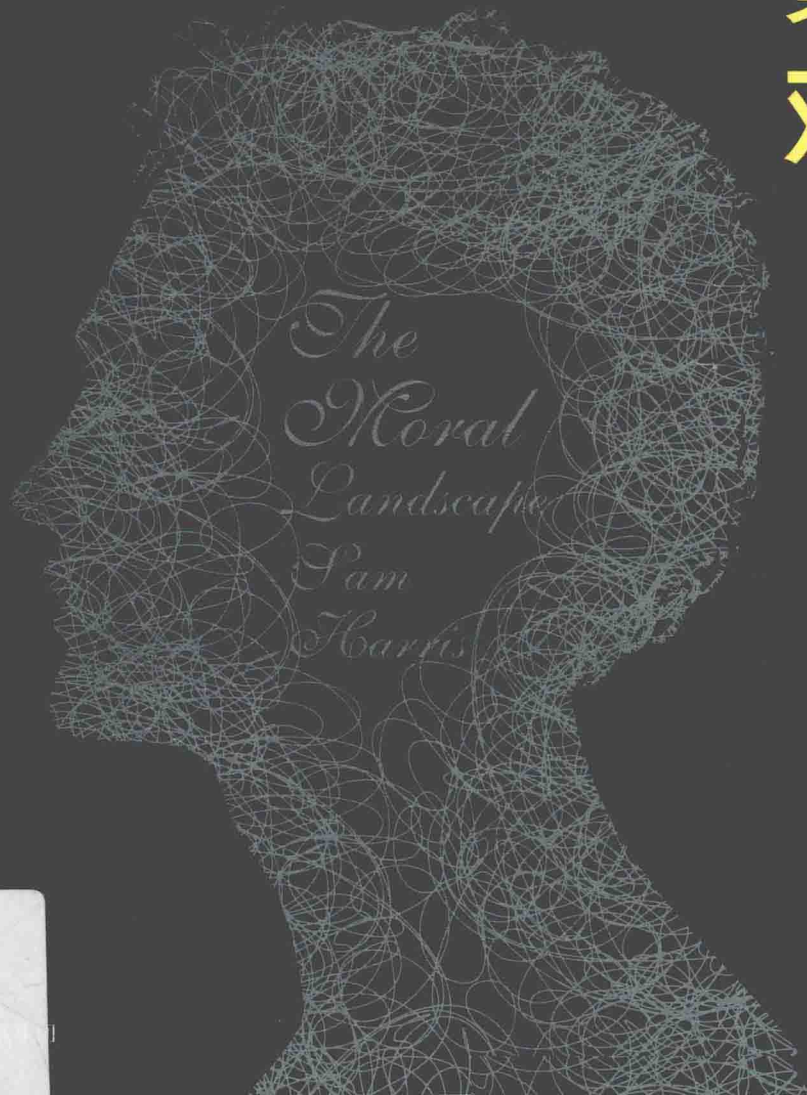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科学如何决定 人性价值

[美] 萨姆·哈里斯 —— 著 于嘉云 —— 译

道德景观



*The
Moral
Landscape
Sam
Harris*

道德景观

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美] 萨姆·哈里斯 著

于嘉云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景观：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 (美) 萨姆·哈里斯著；于嘉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1
书名原文：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ISBN 978-7-5086-7903-7

I. ①道… II. ①萨… ②于… III. ①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3874号

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Copyright © 2010 by Sam Harr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文由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授权使用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道德景观：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著 者：[美] 萨姆·哈里斯
译 者：于嘉云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232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903-7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导 论 道德景观

第 1 章 道德真理

众人皆承受之最大可能的不幸 / 045

高挂“容忍”名义的道德盲目 / 050

道德科学 / 054

第 2 章 善与恶

我们对是非能否总有“对”的时候呢? / 075

道德悖论 / 078

公平与等级体系 / 089

为善会太难吗? / 094

为多样性困惑 / 097

道德的头脑 / 103

精神变态 / 108

邪恶 / 113

自由意志的错觉 / 116

道德责任 / 120

第3章 信念

什么是“信念”? / 131

在大脑中寻找信念 / 134

偏见的浪潮 / 138

误会我们的极限 / 143

信念与推理 / 148

没有欺骗的世界? / 150

我们有相信什么的自由吗? / 153

第4章 宗教

宗教与进化 / 167

宗教信仰特别吗? / 173

宗教要紧吗? / 175

信仰与理智的冲突 / 180

第5章 幸福的未来

科学与哲学 / 205

幸福心理学 / 207

我们该满足于哪个自我? / 211

关于对或错 / 214

致 谢 / 221

注 释 / 224

参考文献 / 272

导论：

道德景观

阿尔巴尼亚人有个仇杀的古老传统,叫作“卡努恩”(Kanun):如果一名男子犯下凶杀罪行,受害者家族就能杀掉他的任何一名男性亲戚作为报复。一名少年如果不幸是凶手的儿子或兄弟,那他就得昼夜躲藏,放弃正当教育、适当的医疗保健,以及正常生活的乐趣。甚至到现在,还有数不清的阿尔巴尼亚男子与少年在家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①我们能说阿尔巴尼亚人用这种方式来建构社会在道德上是错的吗?其血债血偿的传统是一种邪恶的形式吗?他们的价值观比我们的低劣吗?

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科学能够提出这类问题——更别说解答了。我们怎能从科学事实的角度宣称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更好或更道德呢?“好”或“道德”的定义该由谁来界定呢?虽然现在有许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道德的进化,以及其基础的神经生物学,但他们研究的目的不过是要描述人类如何思考与行动;没有人期待科学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对于人类价值的争议,科学其实是避而不谈的,没有任何“官方”意见。^②

然而,我将论证价值观——亦即意义、道德及生命之更大目的——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有意识生物的幸福(well-being)问题。因此,价值观转换成能在科学上理解的事实:关于正面与负面

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具体法律及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的神经生理学等等。这些事实中最重要者注定会超越文化——就像关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事实那样。癌症在新几内亚高地还是癌症，霍乱还是霍乱，精神分裂还是精神分裂；同样地，我将进一步论证悲悯（compassion）仍是悲悯，幸福仍是幸福。^③而且，如果人们对于如何达到繁荣有重要的文化差异的话——例如存在着相互对立但同等有效的方式来养育快乐、聪明、有创造力的孩子——这些差异也必定依赖人类头脑组织的事实。因此，原则上，我们能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语境中解说文化界定我们的方式。我们在大脑的层次上对自己了解越多，就越能明了关于人类价值问题的答案有对有错。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若干对于道德真理地位的古老歧见：自宗教撷取世界观的人一般相信道德真理的存在只是因为上帝将之注入现实架构当中；至于缺乏此信念的人，则往往认为“善”与“恶”的看法一定是进化压力和文化发明的产物。对于前者，一旦说到“道德真理”（moral truth），必将援引上帝；对于后者，“道德真理”不过是表达个人的猿猴冲动、文化偏见和哲学困惑罢了。我的目的是想说服读者，论辩双方都错了。本书旨在开启一段关于道德真理如何能在科学语境中得到理解的对话。

尽管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论证势必引起争议，但它却是依托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人类幸福完全建构于世界中的事件以及人脑的状态。因此，一定有关于它的“科学真理”（scientific truths）有待探知。对于这些真理更详尽的理解，将会迫使我们对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清楚的区别，判断某些方式更好

或更坏,更多或更少地忠于事实,以及更合乎伦理与否。显然,这种认识能帮我们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攸关数百万人生活的抉择问题。

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保证能通过科学解决每个道德争议。意见的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意见会越来越受制于事实。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解答一个问题,并不代表该问题没有答案。到底有多少人在过去 60 秒钟内被蚊子叮了呢?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会得疟疾呢?有多少人会因此而死亡?在所涉及的技术挑战下,没有科学团队能应对这种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它们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而已。因为没有能力搜集到所有相关数据,我们就必须同等尊重所有意见吗?当然不是。同样地,我们可能无法解决特定的道德两难的事实,并不代表所有具有争议性的解释都同等有效。在我的经验中,把实践中无解误认为原则上无解是道德混淆的一大根源。

例如,美国有 21 个州仍然准许学校体罚。在这些地方,即便老师拿木板把孩子打得肿起瘀青甚至破皮,他们的行为依然合法。几十万的儿童每年蒙受这种暴力,几乎全发生在美国南方。可想而知,使这种行为合理化的根据明显出自宗教:因为造物主自己告诉我们“孩子不打不成器”(《箴言》13: 24、20: 30、23: 13~14)。然而,我们如果真的关心人类幸福,并且用提升幸福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我们就可能会怀疑用小男孩、小女孩以受痛、受惊、在公众前受辱的方式,来作为鼓励其认知与情绪发展的手段是否明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对此有任何怀疑的空间吗?寻求正确之道是重要的,对此有任何需要质疑的地方吗?其实,所有研究都指出,体罚是灾难性的做法,会导致更

多暴力和社会病态——而且会事与愿违地导致更多对体罚的支持。^④

但更深的要点在于,无论我们是否知道答案,这种问题一定有答案。而且,绝对不是简单地用“尊重别人的‘传统’,同意彼此存有歧见”,就可搪塞过去。为什么科学将越来越能够断定这种问题呢?因为人们给出的各式各样的解答——以及伴随而来的在人际关系、心理状态、暴力行动与法律纠葛等方面的后果——都转译成了我们脑子里、别人脑子里,以及整个世界中存在着的差异。我希望表明,当谈到价值观时,我们其实谈的是一个由事实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世界。

想法和意图如何在人脑中产生,这些精神状态又如何转换成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进一步影响世界和其他有意识生物的经验——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事实。我们将看到上述事实穷尽了对“善”与“恶”这类词语的合理说明。它们也将越来越落入科学的范畴,比一个人的宗教皈依要深刻得多。正像没有基督教物理学或穆斯林代数学一样,我们也将知道,根本没有基督教道德或穆斯林道德这样的东西。的确,我将论证道德应该被视为科学中尚未开发的一支。

自从我的第一本书《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出版以来,我观察所谓的“文化战争”就有了优越的视野——在美国是世俗的自由派与基督教的保守派之战,而在欧洲是无宗教群体与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之间的争端。在收到过数万件处于信仰与怀疑连续光谱上各个位置的群众的来信和电子邮件后,我能有一些自信地说,在这些文化分歧的基础上,有个对理性之局

限的共同信念。双方都相信,理性对回答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而一个人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似乎影响到他对几乎每项社会重大议题的观点,从打仗到教育孩子。

这种思考上的断裂在政治光谱的各端有不同的结果:信教的保守派往往相信意义与道德问题是有正确解答的,但只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认为如此。^⑤他们承认,寻常的事实能通过理性的探索来发现,但他们相信价值必须来自旋风中的玄妙声音。刻板地遵照《圣经》的字面意思、对多样性的不宽容、对科学的不信任、忽视人类和动物受苦的真正原因等等——太常见了,这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划分在宗教右派中的显现。

另一方面,世俗的自由派则往往认为道德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存在。虽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可能比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更符合我们对于善的文化理想,但大部分世俗主义者怀疑,穆勒的是非理念并没有更接近真理。多元文化主义、道德相对论、政治正确、宽容以及对不宽容的宽容,这些都是左翼把事实与价值分开的后果。

我们应当关心的是这两种导向并未产生同等效能。在老式宗教非理性的狂热下,世俗的民主国家越来越苟且。保守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怀疑论的并轡,导致美国禁止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它说明了我们为何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议题上持续蒙受政治上的纷乱;也可说它是联合国目前正在努力促成的反亵渎神明法的基础(该法将使会员国公民批评宗教变成非法);它使西方在其反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世代战争上捉襟见肘;它可能还会把欧洲诸社会再塑造成一个新的哈里发(Caliphate)

辖地。^⑥掌握宇宙造物主所信的是非,激励了信教的保守派几乎不计代价地在公共领域强施这种愿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者根本不认为有什么真正对的事物——常导致世俗的自由派高举双手投降,放弃他们的理智标准和政治自由。

在科学共同体里世俗与自由派占压倒性的多数,但科学家对宗教的教条主义所做的让步也着实惊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问题上达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连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都无法有效地区分合理论述和虚构神话之间的分界。我最近查了过去十年该刊中每一次出现的“宗教”(religion)一词,发现《自然》的编辑们一般都接纳了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注定失败的观念:“互不重叠的权威”(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即适当建构的科学
与宗教不可能起冲突,因为它们构成不同的专长领域。^⑦正如某篇社论文章所言,只有当个别领域“越过界并激起骚动时”,问题才会出现。^⑧其基本主张是:科学乃是处理物理宇宙运作的最佳权威;宗教则是对意义、价值、道德与美好生活的最佳权威。我希望能说服您,这不仅不真,而且不可能是真的。意义、价值、道德、美好生活等,一定与关于有意识动物幸福的事实相关——而在我们的例子中,一定合乎规律地仰赖于世界中的事件与人脑状态。理性的、不预设立场的、诚实的探索,一直都是洞察这种过程的真正源泉。就算信仰曾经在什么事情上是对的,那也是偶然误打误中的。

科学界不愿在道德议题上采取立场,已经为此付出代价。

它使科学看起来似乎在原则上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彻底分离。从流行文化的观点来看,科学经常只像个科技的孵化场而已。虽然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承认,在关于事实的层面上,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已给宗教带来重重难堪,但无论在科学圈内外,一条几乎不容置疑的铁律就是,科学对构成良善生活的要素并没有什么话可说。涵盖众信仰及政治光谱两极的宗教思想家正是在这点上联合起来;我们最常听到的对信仰上帝的辩护,并不是有他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而是对他的信仰是意义与道德指引的唯一可靠来源。互不相容的宗教传统现正避居于同一套不合逻辑的推论背后。

然而似乎无可避免地,科学终将逐步涉及生命中最深刻的问题,而这势必会激起反弹。如何应对继之而起的世界观的碰撞,自然会影响科学的进步,但它也可能决定我们是否能成功建立一个共享价值观的全球文明。对于人类该如何在 21 世纪生活的问题,存在很多相互竞争的解答,而它们大部分必定是错的。只有对人类幸福的一个理性的理解,才能让数十亿人和平共存,臻合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目标上。一个关乎人类兴旺发达的科学似乎还其道迢迢,要达到目的,我们必须先承认该智识领域确实存在。^⑨

贯穿本书的是一个我称之为“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的假设空间——一个包含现实与潜在后果的空间,其高峰对应于潜在幸福的顶点,而其幽谷则对应于可能的最深苦难。不同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习惯、伦理规章、统治方式等等——将转译成穿过此景观的运动,因此转译成不同程度的人

类昌盛。我并非主张我们必须对每个道德问题都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或者单一的让人类生活下去的最好方式。有些问题也许容许多个约略等值的答案。然而,道德景观上的多重高峰并不代表它们较不真确或不值得发现,登在峰顶与卡在低谷的差别也不会因此变得更不清楚或更不具效力。

道德问题有复数解答未必会对我们构成问题,试想一下我们怎么考虑食物:没人会辩称一定只有一种正确的食物可吃。然而在健康食品与毒药之间还是有客观的事实。虽然有例外的情形——例如有些人吃花生会死——但我们能在对化学、生物学、人类健康等理性讨论的语境中解说这些例外。世界上食物种类的丰富,并不会诱使我们宣称在人类营养方面没有什么尚待探索的事实,或者所有烹饪风格在原则上一定同等健康。

穿越道德景观的运动可以在许多层次上分析——范围涵盖生物化学到经济学——但就人类而言,变化必然依赖人脑的状态与性能。我虽然完全支持科学中“融通”(consilience)的看法^⑩——因而把科学的专业分界主要视为建构学院殿堂的功能,以及个人在一生中所能学习的局限——但神经科学与其他心智方面的科学在人类经验议题上的首要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人类经验显示了生存的每个迹象都被人脑的状态所决定与实现。

许多人似乎认为一个共通的道德概念势必要求我们寻找没有例外的道德原则。例如:如果撒谎真的是错的话,那它必须总是错的——而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例外,那任何道德真理的看法就必须放弃。可是道德真理的存在——即我们怎么思考、怎么行为与我们的幸福之间的关联——并不要求我们依据不变的道德知觉来界定道德。道德可以很像国际象棋:肯定有一般

适用的原则,但也可能允许重要的例外。你若想玩好国际象棋,像“别失去皇后”这样的原则几乎总是值得遵守。但也允许例外:有的时候牺牲皇后是精彩的一招,偶尔甚至是唯一可走的一步。然而,依旧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盘棋局中,从任何位置都将有某种范围内客观的好棋法和客观的坏棋法。如果对于人类幸福有待知的客观真理的话——例如仁慈是否通常比残忍更能导致快乐——那科学有一天应该能对我们的行为与关注对象做出非常精准的断言:哪些在道德上是好的,哪些是中性的,哪些是值得放弃的。

虽然说距离我们对人类如何昌盛有完全了解还很远,但零碎的解釋正在出现。例如,想一想童年早期的经验、情感联系等,与一个人在人生后来形成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之间的关联。我们当然知道忽视和伤害情感,无论在心理上或社交上都是不好的。我们也知道童年早期经验的作用一定在脑中显真了(realized)。对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了亲本养育、社会性依附、压力调节等,都部分受到后叶加压素(vasopressin)与后叶催产素(oxytocin)等荷尔蒙的支配^⑩,因为它们影响了大脑奖赏系统中的活动。所以当问到为什么童年早期受忽视对我们的心理和社交发展有害时,认为这可能源于此一系统失调似乎是合理的解释。

虽然为了实验的目的剥夺小孩的正常照顾是不合伦理的,社会却不经意地每天在进行这样的实验。为了研究童年早期感情被剥夺的后果,一组研究者在两类人群——传统家庭里养大的儿童与头几年在孤儿院度过的儿童——中测量了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的浓度。^⑪正如你可能预期的,被国家抚养的孩子

一般得不到正常水平的养育。他们也往往在日后产生社交与情感上的困难。正如预测,这些孩子对与养母身体接触时的反应,未能显示正常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的激增。

相关的神经科学才刚开始发展而已,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感情、社会互动、道德直觉等彼此互相影响。我们通过这些系统与其他人产生调和,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变成了进一步的社交、情感、道德等发展的一个机制。毫无疑问,人脑正是这些影响的枢纽。文化规范借改变我们头脑的结构与功能来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你觉得比起女儿你更想有儿子吗?对父母权威的服从比诚实的探究更重要吗?如果你得知孩子是同性恋者你会停止爱孩子吗?做父母的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以及在他们孩子生活中的后续作用,一定会转译成关于他们大脑里的事实。

我的目标在于说服你,人类知识与人类价值观并非是分离的。量度的世界与意义的世界最终必须调和。而科学与宗教——正是对同一现实恰恰相反的思考方式——则永远不会和解。正如所有的事实问题一样,对道德问题的不同意见无非是显示了我们知识的不完整;它们并不使我们必须无限期地尊重纷纭的观点。

事实与价值

18 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有段著名的论述:没有任何对世界如何(事实)的描述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道德)。^③继休谟之后,哲学家摩尔(G. E. Moore)宣称,